

共和国回顾丛书

中国1966

风乍起

F E N G Z H A Q I

· 张志忠 著 ·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

一言难尽的报纸们

功高震主者身危·打在“左”派的痛处·张春桥搭上直通车

陆定一三罪归一·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动乱的闸门打开了



解放军出版社

共和国回顾丛书

中国1966

风乍起

F E N G Z H A N G Q I

· 张志忠 著 ·



社
会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第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乍起/张志忠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1

(共和国回顾丛书)

ISBN 7-5065-3752-4

I. 风…

II. 张…

III. 文化大革命—历史

IV. D652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25 千字 印数: 6000 册

定价: 24.60 元

目 录

引 言 忘却与记忆	[1]
-----------------	-------

第一章 黄浦江卷起第一个浪潮	[9]
----------------------	-------

金色的收获季节·序幕揭开了·舞台小世界，
世界大舞台·向政治局常委保密·“我们的批判，不
应该这样!”·在压力下的中宣部长·“泰山”和“东
海”之喻·一言难尽的报纸们·吴晗检讨：“我忘记
了阶级斗争!”·平衡术与“台风眼”·“诱敌深入”·
开辟“第二战场”·西子湖畔话“要害”·各有所言的
三篇元旦社论·爆竹声中一岁除

第二章 军中“新秀”的崛起	[90]
---------------------	--------

“大警卫员”巧探虚实·既做“报告”又“讲话”·
“出气会”上“反弹琵琶”·“功高震主者”身危·为了肩
膀上的一颗“星”·如何“通气”·剪不断，理还乱的政

治账·林彪把口号喊破了天·从战争骄子到政坛高手
·所谓“三次大的斗争”·“金牌”和“密信”·一群“新星”升起在中国政坛上·“四个指头”与“小节无害”

第三章 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198]

张春桥搭上了“直通车”·北京的“秀才”们不甘落后·五人小组和《汇报提纲》·打在“左派”的痛处
·“差点打起来”,忽尔又联手·只有一个人宣讲的“座谈会”·“大笔杆子”为《纪要》增色·毛泽东三改“纪要”,林彪两拟信稿·中央批语发发收收·《纪要》解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第四章 动乱的闸门打开了 [269]

并非节外生枝的两起外交事件·大批判洪流漫卷而下·“文章满纸书生累”·第一次公布了“文化革命”的设想·罗大将军陷入绝境·“政变经”矛头所向
·陆定一三罪归一·茫然躁动的新闻界·“金棍子”再抡大棒·戚本禹的致命一击·杨尚昆“窃听事件”真相·十年京兆一书生·“三点体会”和“三个意外”
·最高权威的“剥笋”说·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从思想批判到组织处理·一份《通知》决定了一段历史·正是神都有事时

后记 [393]

主要参考书目 [395]

引言 忘却与记忆

如果没有那样一场堪称战争典范的伟大战役，谁还会记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呢——据说，拿破仑这样说过。

他指的是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村落，在那里，拿破仑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1805年11月13日，法军开入维也纳，然后乘胜追击俄奥联军，进入摩拉维亚。12月2日，在这个小村庄附近举行了后来被名之为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著名会战。俄奥联军方面对此役予以最高度的重视，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亲赴战争前线，并且在实际上接替了联军统帅库图佐夫的指挥权，亲自指挥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建立以来的首次交战。孰不知，临战换将，正犯了兵家大忌，被换掉的又是后来在莫斯科战役中击败拿破仑并最终取得反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的库图佐夫，更何况，拿破仑兵威正盛，锐不可当。俄奥联军决定在奥斯特利茨以西攻打法军，首先要占领制高点普拉琛高地。拿破仑以退为进，故意让出高地。于是，盟军发动总攻，以4万大军进攻法军的南翼，企图切断他们与维也纳的联系。正当盟军的进攻被击退的时候，拿破仑命令苏尔特元帅率领2万法军步兵冲上斜坡，直捣普拉琛高地。苏尔特攻占高地以后，盟军多次试图夺回它，都没有成功。是役，盟军死伤达1.5万人，被俘1.1万人，而拿破仑仅仅损失9000人。在列夫·托尔斯泰

的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里，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安得烈王爵就是在奥斯特利茨作战负伤；被剥夺了指挥权的库图佐夫为他的士兵所能做的，就是在大军败退的时候，在阵地上到处留下给拿破仑皇帝的公开信，希望他能宽大为怀，收容和医治被遗弃在战场上的俄国士兵。拿破仑果然有大家风度，包括安得烈王爵在内的受伤后来不及带走的俄军官兵都得到很好的对待。

历史，往往就是在这些并非刻意的时空选择中演进的。

中国。1965年11月10日。

这一天，在当时看来，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但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它却逐渐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在时光的显影液中，它的底蕴日见其深。

一位曾经在上海外语学院亲眼目睹了1966和1967两年的“文革”进程的外籍教师，《上海报道——文化革命目击记》一书的作者亨特·尼勒，非常敏锐地把姚文元在这一天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比喻为“潘多拉打开了盒子”。

“潘多拉打开了盒子”，是希腊神话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奥林匹斯山上的以主神宙斯为首的一群神祇，各有所管，性格各异，对待地上的人们，态度各有不同，给人们带来的苦乐也不相同。有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同情人类的艰难处境，一心想帮助他们。于是，在他们向主神宙斯杀牛献祭的时候，他教给人们，把祭品分成两堆，用牛皮蒙起来，把牛头和牛骨的一堆堆得大一些，把牛肉的一堆堆得小一些，这样，宙斯受骗挑选了较大的一堆，人们则争取到较多的利益。他还把天上的火种盗了来，无偿地给予人类，又一次地损害了宙斯的权威。宙斯在严厉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同时（他把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的山崖上，并且派兀鹰每天去啄食他的内脏），还设计报复人类，以抵消普罗米修斯的馈赠。他指派天上的工匠用泥土制作了一个妇女，名为潘多拉，诸神都把他们的精美礼物送给她，她带着一个盒子来到人间。国王厄庇墨透斯忘记了他的哥

哥普罗米修斯的警告,与潘多拉结为夫妻,潘多拉则由于宙斯的安排,抵抗不住诱惑,打开她从天上带来的盒子,结果,苦难、灾厄、劳役、邪恶、疾病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都从盒子里飞出来,作祟人间,潘多拉急忙把盒子盖起来,已经无济于事,只有希望还留在盒子里。于是,从此以后,人们就只能凭借心中仅存的希望与种种灾害做斗争。

是的,如同亨特所认为的那样,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确是一个不祥的行动,它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带到了当代中国。而在姚文元的背后,也确实有着权威的旨意。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已经 30 余年。

30 年河东,30 年河西。

何况,这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30 年,是一个民族从狂热和愚昧中觉醒的 30 年,是东方古国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困窘中走出来、借着改革开放的雄风腾飞于世界的 30 年。

1966 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年龄。

当年风行一时的毛泽东像章,如今又成为收藏家的追逐对象。

当年传唱甚广的“红太阳颂”、“语录歌”,也曾经再度席卷全国。

随着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上映,数百年前的古人罗贯中写在这部经典作品中的开场诗,似乎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作为《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传唱在神州大地上: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尽管在笔者看来，这支由当今著名的作曲家所谱写的歌曲，似乎热烈有余，苍凉感不足，但它却伴随着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流行而得到大面积的流传，并且潜移默化地把罗贯中笔下的那种历史沧桑今是昨非的历史观化入无数人的心头。

是的，比起世界上许多年轻的国家，我们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澳大利亚，看到它们把有一两百年历史的建筑物、人工制品等等都看作宝贵的历史文物并且加以保护，不禁会哂然而笑，会更加体会到什么叫文明古国，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语：人们珍爱的是他们所缺少的东西。那些建国时间短暂的，分外珍惜他们的一切历史痕迹，对于有着 5000 年文明史和经历过无数暴风骤雨而始终维系了其国脉的中国人来说，在许多时候，却需要遗忘，需要淡化历史，需要告别昨天和前天，需要轻轻松松地上路，潇潇洒洒地前行。

于是，在这漫长而沉重的历史的面前，许许多多的人们都不由地发出充满惆怅和迷惘的感叹。孔老夫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是老祖宗，尤其是对于文人学子而言，他的定六经、授六艺，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可是，对于他自己，他所追慕的周文王周武王，他所推崇的唐尧夏禹，都已经是远古之人，遥不可及，因此，他面对着滔滔江水，才会感慨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悠久的历史，像滚滚的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令后来者望洋兴叹，自惭形秽。孔老夫子这样的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芸芸众生乎。过分厚重的历史，似乎形成一种对每一个正在生存的人的强大压迫，使人急于

摆脱和遗弃之。于是，便又有了对历史的漠然无视、冷淡遗忘的态度。“古今多少事”，都化入白发的砍柴人打鱼者的淡然一笑，都不过成为他们举杯饮酒时助兴的谈资。

今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反映当代人生活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渴望》，在许多方面与《三国演义》都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在通过回忆历史以告别历史的潜在心理上，却又是如出一辙的。请回忆一下那首被毛阿敏唱红了大江南北的片头歌：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
这样执著
又是为了什么？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
瞩望人间万家灯火。
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
心中渴望
真诚的生活。

需要加以强调的是，《渴望》所表现的，并非平淡无奇的岁月，而是曾经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动荡和惨重伤害的“文革”时期，是从共和国主席到平民百姓含冤受屈难以幸免的噩梦笼罩的日子。从造反抄家、戴高帽挂纸牌“喷气式”游斗到株连九族殃及子孙，从国民经济的濒于崩溃到千百万青年人的失学失业上山下乡，从街

头清一色的绿军装、蓝工作服、灰中山装，到无数次地重复上演强行推广的“样板戏”……

还有，1995年年中，中国歌剧院重新演出保留剧目《白毛女》，却由此引出青年人的疑问——对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一无所知的新一代人，“欲说当年好困惑”，他们发问，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钱，理所应当归还，穆仁智逼还欠债乃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错？

不要说50年前的事情，从70年代到90年代不过是20年的距离，历史的恩恩怨怨已经或者正在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同样是在1995年年中，一部以70年代初期即“文革”中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的电影，由有中国的“影帝”之称的姜文所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京城上映，火爆一时，也引起一些关于如何看待和反映“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争论。一位今天的中学生为之大惑不解——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像影片中的主人公马小军一样有着骚动不安的少年情怀呀。在对“文革”所知甚少的他看来，人们为《阳光灿烂的日子》进行的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这个中学生、马小军的同龄人去理解20余年前的往事，是不切实际的。他毕竟还是少年人，还没有足够的接受和思考的能力去面对即使是当年那段生活的亲历者也无法说得清楚的历史，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支歌中所唱的，“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但是，历史并不就是过眼云烟。作为具体的个人，“恩怨忘却”，告别既往，埋葬往日的辛酸，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无可厚非的。心理学上讲，人有一种保护性忘却的心理机制，就是有意无意地忘掉那些沉重而痛苦的往事，摆脱过去发生的苦难带给人们的不堪承受的压迫，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但是，作为一个刚刚从昨天的梦魇中走出来并且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民族，作为承担着民族的思考和认知的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在社会的演进中，在今昔的对比中，获得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感的人们，又怎么能够轻易地为昨天画一个句号呢？

与这种遗忘相抗衡的,是顽强的记忆功能。展望世界各国,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间完备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的典籍,把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并且形成规范的修史制度和历史编撰方法的国度,怕是非常罕见的。孔子把历史的编修作为弘扬他的社会理想的一种方式,传播他的仁政思想,于是才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太史公司马迁忍受常人难以承当的奇耻大辱,发愤著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至高至极。修史被看作神圣之举,先前的王朝覆灭了,后来的统治者仍然有义务为其补上这必不可少的一笔。同样地,读史也被认为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大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之鉴,可以知兴替”……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典籍的特殊兴趣,他在文章和谈话中所大量引用的史实和人物,都是广为人知的;近年来被史学界予以极高评价的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同时,一直是以卧龙即诸葛亮式的人物自许,指望用他的史学和史识参与国家大计,并且把这种心态反复地吟唱出来,“吾侪所学关天意”,“欲著《辨亡》向谁陈”。

同样地,在关于 30 年前发生的那样一场席卷全中国、长达 10 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文化的冲突,虽然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淡漠,但是,也有人在顽强地抗拒遗忘,要为那一段荒诞奇特的历史留下某些记忆,书写永不磨灭的记录。在为《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这样说:

自从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邵燕祥提出建立“‘文革’学”的意见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在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呼吁。

另一方面,据《文学报》1988年8月4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对一批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青少年的调查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年轻的战士有的不知道林彪是谁,年轻的工人有的不知道“牛棚”是什么东西,大学生有的怎么也不相信“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愚昧行为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是的,更多的人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终生难忘;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也需要深刻地理解“文化大革命”。况且,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

当我引述这段文字的时候,离廖盖隆先生写下它的日期已经又过了七八年。在这样一段不能说是很短的日子里,笔者一直在思考“文革”的有关命题,也关注到了国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出版物的情况。正是因为感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使命感,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在1966—1996这样意味深长的时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并不算太短的一篇关于忘却与记忆的话,作为我的“文革”研究的开端。我坐在我的电脑前面,一个人默默地与机器对话,我想,关心和致力于“文革”研究的,不会太少,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并且把它做得尽可能深入一些,认真一些。是为引言。

第一章 黄埔江卷起第一个浪潮

金色的收获季节

中国。1965年11月10日。

这一天，秋末冬初。在中国的北部，可能已经感到了冬天的足迹，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正呼啸着向黑龙江大平原张牙舞爪地扑过来，向人们争夺一年来在田野上耕耘劳作的果实，促使人们加快收获的节奏；在温暖的南国，连绵的细雨，迷迷蒙蒙，洒播着一片片秋天的遐思，让少男少女们，平添几许甜蜜的忧愁；在中国的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则是另有一番景象：号称是一年之中最美的金秋时节，把它美丽的身影继续向后延伸，迟迟不肯离去，初起的一阵阵寒风，又染红了香山和八大处一带的满山满坡的枫树和黄栌；西山红叶，吸引了众多的游人，从远古一直传衍下来、具有“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也不甘示弱，以一树灿烂的金黄，装点着秋末的蔚蓝天空；濒临大海的城市上海，这一天的天气预报是晴到少云，4、5级北风转东北风，气温6到18摄氏度。

这一天，在当时看来，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但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它却逐渐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在时光的显影液中，它的底蕴

日见其深。

1965年的11月,中国的国内外大事记,应当记载哪些内容呢?

11月1日,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开始展出。周恩来、朱德等参观预展。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地处山西省的煤炭重镇阳泉附近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和它的那位永远头罩一块白羊肚手巾的领导人,陈永贵,不仅仅是作为响应时代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发展生产,抗灾自救的先进生产典型,越来越引人注目,它还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11月4日,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该国外交部递交一份照会,强烈抗议印尼右派袭击我驻棉兰领事馆的反华暴行。印尼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中国的党和政府在印尼事件中的态度立场,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驻印尼的使领馆人员,和在印尼的为数众多的华侨,首当其冲地经受着“排华”恶浪的冲击。

11月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第一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在京召开。

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王杰同志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身为济南部队某部班长的王杰,在一次实弹投掷中,一位战友由于过分紧张,导致手榴弹在拉了导火索后没有投出,却失手落在身边的危急情况下,挺身而出,扑在战友身上,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继雷锋之后,又一个年轻的战士形象,矗立在神州大地上,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习的杰出典型。

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三月分裂会议上莫斯科新领导及其追随者的反华言论》。紧接着,在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驳苏联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长文。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中苏两党之间试图改善相互关系的努力,已经宣告结束,新一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

义”的论战,再次趋于升温。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洋框框,发挥创造性》。

11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殖民当局悍然宣布的所谓“独立”,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帝反殖斗争。

同日,我海军在浙江沿海和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分别击沉击伤蒋军军舰“太平号”和“永昌号”、“永泰号”。这是我国年轻的海军自组建以来在海上作战中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11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日本佐藤政府强行通过“日韩条约”,痛斥美帝勾结日本反动派,采取扩大侵略战争步骤。

11月24日,毛泽东和夫人江青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近年来,江青打破了几十年形成的不公开抛头露面的惯例,开始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外事活动,但是,在普通民众眼中,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同日,新华社报道: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题词,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题词是选录王杰的一首诗: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的题词是:学习王杰同志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题词是: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一意为革命。学习王杰的活动,由于中央领导人的题词,逐渐形成高潮。

11月2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全军继续突出政治,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阿尔巴尼亚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是不打不倒的,修正主义是不斗不垮的。

从以上的新闻摘要中可以看出,在国际斗争上,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继赫鲁晓夫之后新上台的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再度发动了

新一轮的对中共的攻击,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尘烟再起;印尼的反华排华逆流甚嚣尘上,在那美丽的“千岛之国”的华人同胞的命运,格外令人担忧;还有,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导致战争继续扩大,激起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与越南比邻的中国人民的密切关注和强烈谴责——同月的2日和9日,先后有两名美国青年,诺尔曼·莫里森和罗格·拉伯特在反战运动中以自杀表示对美国政府的最大抗议。国际斗争形势复杂,反华恶浪阵阵袭来,依照当年的宣传口径和思维习惯,却是越加使全党全国更加自豪和斗志昂扬——敌人的反对,正好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与此同时,在国内,则是一片热烈气氛:学大寨,学王杰,学毛泽东思想,既有艰苦创业的楷模,又有舍己救人的英雄,还有思想上的指路明灯,加上对台湾国民党海军作战的重大胜利,相互激励,充满了蓬勃向上之气。还有一条未见诸报端的新闻,彭德怀同志复出,赴四川成都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职务。他对随员说:“最近,毛主席和我谈通了,把过去的事情了结了,销了账。他说,过去可能把我误解了,批过了,可能真理在我一边。他点了将,要我到西南来,在这里建设的一个大工业基地上负点责,本来不愿意来,总不好违了他的令,拂了他的意……”

序幕揭开了

比较起来,在一家地方性报纸的版面上,登载了这样的文字,似乎极其平常,也许还会被认为是文化艺术思想活跃的表现呢

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